

乌尔里希·茨温利与苏黎世宗教改革（1519–1531年）——概述与总结

Dr Alexander Ressos, TEP

Attorney-at-Law (Switzerland), Solicitor (Hong Kong),

Solicitor (England & Wales)

1519年1月1日，在他三十五岁生日那天，一位来自托根堡的神父登上了大明斯特教堂的讲坛，宣布他将从头至尾、逐章讲解《马太福音》，以取代礼仪年中固定的经文诵读。几周之前，即1518年12月11日，Huldrych Zwingli刚刚被选为这座教团教堂的民众司铎。¹十二年后，即1531年10月11日，他倒毙在卡佩尔阿尔比斯（Kappel am Albis）的战场上，获胜的天主教军队将他的遗体作为异端分子焚烧。在这两个日期之间，苏黎世城改变了它的宗教、婚姻法、学校、济贫制度、外交政策，以及其领土内大部分土地和地租的所有权。它是通过本市议会自己的决定做到这一点的——这些决定在议会厅中作出，并由议会的官员执行。苏黎世宗教改革是一个具有欧洲意义的神学事件。而在其日常运作中，它首先是一项市政治理工程。

本章追溯这一工程，从Zwingli到来直至他去世以及随后的和平解决。本章提出律师或银行家在面对政权更迭时会提出的问题：由谁决定，依据何种权力，经由何种程序，对财产、收入和贸易产生何种后果？这些问题的答案在形式上惊人地具有现代性。苏黎世议会将真正教义的问题视为一个它作为城市合法当局、在公开辩论中听取论证之后有权作出决定的问题。它通过协商移交和行

乌尔里希·茨温利与苏黎世宗教改革（1519–1531 年）——概述与总结

政法令接管了宗教机构的资产，将其置于一套会计机构体系之下，并将其收入用于由它自己界定的目的。它拒绝了当时任何联邦州所能获得的最有利可图的合同——1521 年的法国同盟，并禁止其市民接受外国年俸。它使印刷机成为公共辩论的工具，并且几乎是顺带地，让德语欧洲最多产的出版社之一在这座城市成长起来。

虽然此后两个半世纪苏黎世都没有银行，但这一时期对于今天的金融中心仍然重要，因为宗教改革在该市的政治文化中确立了一系列倾向。苏黎世学会了将议会视为公共道德和公共资金的共同守护者，并对用来收买政治影响力的外国资金心存警惕。这座城市还建立了一套以世俗化捐赠基金供资的公共教育和济贫体系，并将印刷文字发展成为一个产业。这些习惯构成了后来几个世纪的商人、丝绸制造商以及最终银行家开展经营的环境框架。关于济贫的详细规定，即 1525 年的《济贫条例》（Almosenordnung），以及 Zwingli 和 Bullinger 关于利息和财富的教导，此处仅作概述，因为它们分别是第 B.II 章和第 B.III 章的主题。与加尔文治下日内瓦的比较则留待第 B.IV 章。

1 注释

1. Thomas Konrad Kuhn, “Zwingli, Huldrych”, Neue Deutsche Biographie 28 (2024), <https://www.deutsche-biographie.de/sfz26927.html>, 该文给出的选举日期为 1518 年 12 月 11 日，就职日期为 1519 年 1 月 1 日。关于 Zwingli 出生日期定为 1484 年 1 月 1 日，参见 Historisches Lexikon der Schweiz (HLS), “Zwingli, Huldrych” (Christian Moser), <https://hls-dhs-dss.ch/de/articles/010447/2014-03-04/>。

2 结论

1519 年至 1531 年间的苏黎世宗教改革是一项由市议会在一位天才布道者协助下实施的市政工程。Zwingli 提供了神学、修辞以及纲领的大部分内容，而议会则提供了将纲领转化为秩序的程序、决定和行政机构。1523 年的辩论确立了议会作为教义裁判者的地位。1524 年和 1525 年宗教机构的解散——始于 Katharina von Zimmern 经协商移交圣母大教堂——将领土内很大一部分生产性收入转移给了公共机构，后者将其用于教会、济贫、学校、偿债和领土收购。拒绝法国同盟和禁止年俸切断了其他各州所依赖的一项收入来源，迫使苏黎世依靠自身资源生存。印刷业发展成为一个产业。

这项工程的局限在同一时期也显现出来。议会不容忍其权威之外的异议，并处死了再洗礼派信徒。由于不愿放弃其新财富所依赖的什一税和地租，它令那些将福音书解读为摆脱赋税的解放宪章的农民大失所望。它在外交政策上过度扩张，并在卡佩尔输掉了战争，失去了它的首席布道者，也失去了建立一个改革宗联邦的希望。《第二次卡佩尔和约》将宗教改革限制在已经采纳它的各州之内，而《卡佩尔书》（Kappelerbrief）则将布道者限制在讲坛之上。

1531 年之后留下的是一个改革宗城市国家。它拥有一个处于市政控制之下的教会、一个因世俗化财产而扩大和充实的公共行政、一套由捐赠基金供资的教育和济贫体系、一种市民纪律文化、一个印刷产业，以及对政治中外国资金的持久不信任。Bullinger 时代的苏黎世、洛迦诺难民和丝绸制造商的苏黎世，以及最终商人银行家的苏黎世，都是在这些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

乌尔里希·茨温利与苏黎世宗教改革 (1519–1531 年) ——概述与总结

3 五句话概要

1. Zwingli 曾在马里尼亚诺担任随军牧师并领取教皇年俸，他于 1519 年 1 月 1 日来到大明斯特教堂后，将其布道矛头指向教会传统以及雇佣兵和年俸制度，而苏黎世议会将这一纲领化为已有。
2. 议会在 1523 年 1 月和 10 月的辩论中亲自裁决宗教问题，接管了主教的权力，并设立了婚姻法庭、宗教会议和“先知学院”（Prophezei）等市政机构，以治理教会、纪律和教育。
3. 各宗教机构——始于 1524 年 12 月由 Katharina von Zimmern 移交的圣母大教堂——被解散，其财产被置于公共机构之下，这些机构的收入用于支付教会、济贫、学校、偿债和购买领地的费用，而教会的银器则被熔铸成钱币。
4. 苏黎世拒绝了 1521 年的法国同盟，禁止外国年俸，并直到 1614 年一直置身于该同盟之外；与此同时，曾于 1522 年举办“香肠晚餐”的 Christoph Froschauer 印刷所发展成为一家影响遍及欧洲的出版社。
5. 1531 年卡佩尔之败（Zwingli 在此役中阵亡）为苏黎世的雄心设定了界限，但市政对教会的控制、公共纪律、由捐赠资助的教育、印刷业以及对外国资金的警惕，仍然是后来金融中心得以成长的环境中的持久要素。

仅供一般参考。本文不构成法律或税务意见，不能替代针对个案的专业意见，亦不建立律师与客户关系。本文反映截至 2026 年 9 月的法律状况。

在线版本：cn.helveticaregister.com/zurich-huldrych-zwingli-and-the-zurich-reformation-1519/1531-overview-and-summary